

普通高等学校教材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Daolun



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主 编 刘 敏 徐晓杰

副主编 程丽云 高春燕



东北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普通高等学校教材

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主 编 刘 敏 徐晓杰
副主编 程丽云 高春燕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 阳 ·

© 刘敏 徐晓杰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刘敏, 徐晓杰主编.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3. 8
(2014. 2 重印)

ISBN 978-7-5517-0411-3

I. ①中… II. ①刘… ②徐…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5012 号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主要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宗教、典制、文字、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科技、生活习俗和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内容, 重点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基本精神与特征, 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教材, 也可以作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读物。

出版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3号巷11号

邮编: 110004

电话: 024—83680267 (社务室) 83687331 (市场部)

传真: 024—83680265 (办公室) 83680178 (出版部)

网址: <http://www.neupress.com>

E-mail: neuph@neupress.com

印刷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发行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85mm × 260mm

印 张: 20.5

字 数: 51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组稿编辑: 郭爱民

责任编辑: 孙德海 刘乃义

责任校对: 叶 子

封面设计: 刘江旸

责任出版: 唐敏志

ISBN 978-7-5517-0411-3

定 价: 41.00 元

前 言

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全国高校普遍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应教学之需，佳木斯大学教材服务中心组织编写了《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教材。

本教材融合各版本“中国传统文化”教材的精髓，结合本校学生的水平与特点进行编写，力求做到：

一、宏观探讨与微观阐述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与“文化史”有所不同。后者是按照时间顺序阐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变化发展的历程，而作为“导论”则要按其内涵分类作专题论述。虽然部分专题也要叙述其发展顺序，但重点还是要阐明各专题的特有内容。本教材除导论外，共分11章，既注重从整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宏观探讨，又有对传统文化各个层面的微观阐述。

二、史论结合。本教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变和分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意义等问题均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与分析。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宗教、典制、文字、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科技、生活习俗、中外文化交流等部分分别立专章进行阐述。各章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全书经纬成文、史论结合，交织成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从而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概貌。

三、将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与编者的学习心得、教学实践相结合。本教材尽力吸收以往专家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已取得的共识性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与之相关的新成果，使本教材更为丰富完善、更具有学术前沿性。同时也有编者多年来的学习心得和研究见解。在编写中尤其注重结合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实际和学生的思想认识实际，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这既是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察古以鉴今，彰往以知来”的目的和宗旨，也是明确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目的并提高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之一。

四、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珍品的

目 录

导论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	1
第一节	文化概说	1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与演变	6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	17
第四节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方法	24
第一章	先秦思想文化	27
第一节	儒家思想	27
第二节	道家思想	40
第三节	法家思想	50
第四节	墨家、名家思想	53
第二章	古代宗教文化	58
第一节	原始宗教信仰	58
第二节	道 教	62
第三节	佛 教	67
第四节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73
第三章	古代制度文化	79
第一节	礼仪制度	79
第二节	称谓制度	85
第三节	宗法制度	90
第四节	法律制度	94
第五节	官制和仕进制度	101
第四章	汉语言文字和古代文学	115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115
第二节	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121
第三节	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	127
第四节	古代文学名著举要	133

导论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节 文化概说

一、文化的含义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应当弄清的概念就是“文化”。关于文化的定义，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已有 260 余种之多。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自身同样长久的历史，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类的文化史。因此，对文化定义的纷繁多样的解说，正表明文化自身的广远浩博、包罗万象。

（一）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的含义

在古汉语中，文化是“文”和“化”的复合词。“文”字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云：“五色成文而不乱。”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追根溯源，认为“文，错画也，象交文”。由此原始之义衍生，“文”遂有文字、文籍、文章、文学之义。《尚书·序》上称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进而“文”字有了与“质”“实”相对的精神修养与美善德行之义。《论语》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郑玄注《礼记》曰：“文犹美也，善也。”可见，“文”字自其始，便与今日之“文化”一词有着不解之缘。

综上所述，“文”字在古汉语中有两种基本含义：其一，是指花纹、纹路、纹理；其二，是指文字、文籍、文章、文采、文学之义。在此基础上衍生为与“质”“实”相对的精神修养与美善德行之义。

“化”字本义指事物动态的变化过程。如《易》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礼记》曰，“赞天地之化育”，“和，故百物皆化”。后由此延伸出造化、大化等义，并由自然万物（造化）的生成、变易引申出伦理德行的化成。“文”“化”合用，则见之于《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天文与人文相对，天文是指天道自然，人文是指社会人伦。治理国家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以明耕作渔猎之时序；又必须把握现实社会



中的人伦秩序，以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级关系，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并由此而推及天下，以成“大化”。显然，“文”“化”从最初的合用起，便具有明确的文明教化之义。

“文”“化”二字合用为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束皙在《补亡诗》中也云：“文化内缉，武功外悠。”这里的“文化”都是指与国家的军事手段（武力）相对的概念，即国家的文治教化手段。“文化”作为“文治教化”的缩写，在西汉以后已作为专用名词和常用名词使用。南齐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综上所述，“文化”的概念不外乎文治教化，强调用经典、礼制、道德来教化世人，基本属于精神文明（狭义文化）的范畴。这种理解在我国持续到近代。我们今天常用的“文化”（Culture）一词，其意义显然与古代不同。

（二）西方语言中“文化”一词的含义

西方语言中文化一词的含义既有与汉语对文化的定义相近的一面，又有相异之处。英语中的 Culture（文化）是由拉丁语的 Cultura 转化而来。拉丁语的 Cultura，原型为动词，有耕种、掘垦、居住、动植物培育等与物质生活相关的意义。这种用法至今仍在“农业”（agriculture）和“园艺”（horiculture）中保存着。后来在这种物质性的栽培、种植的意义上引申出神明拜祭、性情陶冶、品德教化等含义。自中世纪起，文化概念已大致与今日西方的文化概念相当，包含了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领域，比我国古代“文化”的含义宽泛得多。

（三）中外学者对“文化”内涵的定义

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是由近代欧洲人提出的。文化学的奠基人、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 1871 年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泰勒着眼于文化的整体性和精神性，把人类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一切精神性创造物的整体界定为文化”，“较早地把文化归纳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② 这一定义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文化概念进行详细考察和整理的是美国文化学者 A. L. 克罗伯和克赖德·克拉克洪。他们于 1952 年发表了著名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对西方当时搜集到的 160 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做了梳理和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概括：“文化由外层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为的产

①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② 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5，6。



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① 这一综合定义确定了文化的符号传递方式及其历史和传统的构成核心，并强调其动态的过程性，既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某种要素。这一文化观念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1973年）将文化的概念作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别。作为广义的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作为狭义的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中国当代学者受前苏联学者的影响，将文化概念分成“物质的”与“精神的”两部分，或称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缩印本（音序）《辞海》对文化的解释为：“‘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把文化概念分成“物质的”和“精神的”或“广义的”和“狭义的”提出质疑。有人认为，除广义、狭义的文化之外，还有“中义”文化，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卫生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等。还有人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物态文化层，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产品的总和；二是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三是行为文化层，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四是心态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等。

（四）文化的本质

文化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心智、德行的塑造。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的本质就在于“人化”。文化作为人的一种对象性活动，其合理性的内容表达必然是对人的本质以及人的主体能力的证明。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唯有通过文化才能体现其本质特性。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的要求、能力和发展程度，都在文化世界中表现出来。而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人的自我完善欲求主导着人的各种文化追求，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塑造了人。人是文化的主体，任何文化实践创造活动都是人的活动，文化的发展规律就是人的活动的发展规律。尽管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学科对文化的理解和界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东西，一切文化都是属人的，纯粹“自然”的东西不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便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创造的“人工世界”及其形式，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也是人工产品同自然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五）“文化”与“文明”

在古汉语中，与“文化”含义相近的概念是“文明”。“文明”之“文”，指文采、

^① 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2。



文藻、文华；“明”指开明、开智、昌明、光明。“文”“明”合为一词，其意为：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尤其是对火的利用）引申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唐朝人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睿哲文明”时所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疏解《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时所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便是对此种意蕴的揭示。中国古代典籍也有将“文明”视作进步状态，与“野蛮”对应的，如李渔《闲情偶寄》中“辟草昧而致文明”即为此例。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文化与文明是同义语，它们都指谓与自然界相对立的人的产物和人的造物。但是，在更严格的意义上，……人们用文明范畴更多地指谓人的活动结果的外在的、有形的、可感的表现形式，而用文化指谓人的造物中深层的、无形的、机理性的东西，即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文明比文化的范畴的外延更宽，人们所直接面对的总是一些文明形态。”^①由此可见，“文化”与“文明”是词义相近，但内涵与外延又有差异的两个概念。“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即人通过有目的的劳作，将天造地设的自然加工为文化。而“文明”则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或泛指对不开化的克服，或指超越蒙昧期（旧石器时代）和野蛮期（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有三：文字的发明与使用，金属工具的发明与使用，城市的出现。古中国的文化史长达百万年之久，而进入创制并使用文字和金属工具的文明时代约4 000年左右。由此可知，“文明”的含义比“文化”广泛得多。

二、文化的基本结构

金元浦、谭好哲、陆学明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认为，“文化的基本结构包括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与精神心理文化”^②，并作了较详尽的论述。现摘要如下：

（一）物质生产文化

物质生产文化是指人类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物质生产的实体性、器物性成果，它们当中也凝聚了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精神因素，但主要显示物质的实体性质，它在物质生产领域内显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客观化程度。物质生产文化主要包括：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构成的现实生产力和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生存需要的消费资料。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活动与成果构成了物质文化。

（二）制度行为文化

制度行为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组织形式，以及在人际交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制度行为文化包含两个层次，在上的层次为制度文化，而制度文化的长期运行又形成在下的民俗民风文化，即所谓“在上为礼，在下为俗”。

制度文化是指人类依据一定的思想观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根本制度，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等，还包括社会组织机构和工作部门的设置形

① 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99。

② 金元浦，谭好哲，陆学明：《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



式及其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规章、条例等。

行为文化是在制度文化影响下长期形成的民族及地域的风俗习惯、行为礼仪、交往方式和节庆典礼等。这种行为文化从属于一定的文化体系，往往超越制度文化的变革而具有历史性。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人类建立社会制度和人的行为规范的活动及其成果构成了制度行为文化。

（三）精神心理文化

精神心理文化是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长期孕育而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因素构成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潜伏在整个文化系统的深层。精神心理文化可细分为与制度文化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和与风俗行为文化相对应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形态层次包括政治理论、法权观念等基础意识形态和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更具观念特征的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层中与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更为广泛深刻的层次是社会心理文化层。社会心理文化层是某一时代、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某一社会形态下长期形成的集体文化心理结构，是风俗习惯等行为文化的内化方式。它特别表现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宗教情感和审美情趣的不同。我们说，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域的文化之所以表现出鲜明的独特性，与其民族或地域文化形成的心理结构密切相关。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人类主体意识的创造活动的过程和成果，构成了精神心理文化。

在文化结构的三层次中，外显的物质生产文化往往随着生产力这一最活跃的因素的变革而迅速变革，它的外在的物质实体比较容易产生变化。处于中层的制度行为文化随着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或快或慢地发生，并由于统治阶级文化的改变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而精神心理文化则内化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它长久地积淀于各民族深层，构成各民族的独特心理结构。它最难于发生变化，其核心的部分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对生活意义的体认。比如，对于外来文化，人们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是物质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外显物质实体性文化，对中层的制度行为文化已有很大的选择性，而对于深层的精神心理文化则很难认同和接受。西方人也是这样，他们欣然接受了中国发明的火药和鞭炮，却无法认同中国人以鞭炮驱鬼避邪的传统信念。马可·波罗很容易地接受了中国的许多发明和先进的技术文明，却无法接受中国人见到皇帝行三拜九叩大礼、仰视“天子”的心理现实。文化差异的关键是深层文化的不同。

可以看出，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与人类的文明同义。狭义的文化则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是指对应于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经济、政治与文化）之一的文化观念。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一）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种界说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习惯上略称为“传统文化”）的内涵，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



解。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其一，传统文化是在过去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指从周秦至清中叶这近3 000年的历史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

其二，“传统文化是指从过去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东西。传统文化是人们无法切断而不停地从过去向现在以至未来涌动的流，任何人都只能生活在这个流之中，而不能跳到流之外。”^① 这种观点看重文化的时代性，它强调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承认文化的传承性。

其三，传统文化是根植于自己民族土壤中的稳定的东西，但又有动态的东西包含于其中，是过去与现实的交融过程，渗入了各时代的新思想、新血液。这种观点强调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统一，承认文化传统和发展，但传统和发展的基础是“自己民族土壤中的稳定的东西”。

其四，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源上讲不是一源分流，而是殊途同归，是各种文化的大融合。从哲学上讲，是各种思想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这是传统文化的多源论。^②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定内涵

综观上述观点可见，研究者由于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不同，由于对“文化”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不同，因而对传统文化内涵作出的界定也不同。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是中华民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是汉族文化融合、摄纳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结果，是中国古代社会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根基。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与演变

一、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勇往直前，从未中断，其主要原因就是它根植于民族土壤，有着恢弘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经济结构及社会土壤。

（一）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演化的地理环境

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文化的生成机制当然离不开自然环境，或曰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又称自然环境，是指被人类改造、利用，为人类提供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包括宇宙的、地质的、气象的、水文的、地文的、生物的等条件。地理环境对文化

^① 王葆玟：在台北召开的“传统中国文化与未来文化发展”学术研讨综述[J]．哲学研究，1993（7）．

^② 张智彦：“传统文化研究”述评[J]．哲学研究，1986（6）．



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人类的文化创造离不开所依托的地理环境，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并受其制约，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往往孕育出不同的文化类型。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发生于亚洲东部大陆，东部、南部濒临太平洋，北部、西北部、西部则深居欧亚大陆的腹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使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诸多不同于欧洲文化、美洲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特色和品格。

第一，内陆辽阔，空间巨大。在这个辽阔的地域里生息的中华民族，有足够广阔的空间创造自己的文化，演绎自己的历史。以中国的政治中心而论，商周时期沿着黄河流域迁移；汉唐时代形成了西安（古长安）、洛阳两个中心，而长江以南的南京（古建康）也在同一时期崛起；到唐宋以后，北京、杭州（古临安）相继为都；明清两代均以北京为都。这足以说明，中华民族自身活动的自然空间很广阔，它的文化创造不需要借助他人的土地，这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自成一体、从未间断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封闭保守特点的环境因素。

第二，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明显的三阶梯状态，高原、丘陵约占三分之二，盆地、平原约占三分之一。山脉多东西走向，河流也因而多东西走向。因此，古时中国东西行较易，南北行较难。南北运河的开凿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运而生的。中国文化中心大体就是沿着自东向西，继之又由西北向东南的方向转移。辽阔的疆域为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提供了纵深腹地，独特的地势决定了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基本路线。

第三，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处于中纬度（北温带），季风气候明显，尤其是东半部的气候、土壤、水利等条件都适宜农业生产，因而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并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农耕文化为主流的特点。

第四，由于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生活条件各异，因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元性特点。除农耕文化外，另有游牧文化、狩猎文化、渔业文化等，这些文化类型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与农耕文化相互依存、渗透补益。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共存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并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多姿多彩。

（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民族渊源

从远古开始，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在祖国各地星罗棋布地出现，并相继形成了许多部落、部族。由于地理环境、生活条件、风俗习惯和历史传统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又由于共同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彼此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联系，虽然时有矛盾冲突，但更多的是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民族间的融合和重新组合不断进行，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兄弟民族统一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

人类的历史记载常以神话传说为开端。中华民族起源于炎帝、黄帝的神话传说。炎帝、黄帝是兴起于黄土高原的部落领袖，根据有关史料推算，炎帝、黄帝时代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炎帝、黄帝两部落分别沿黄河东迁，进入中原地区，与九黎部落相遇，发生军事冲突。先是炎帝战败，接着炎、黄联盟，“涿鹿之战”打败九黎，杀其首领蚩尤。后炎、黄两部落发生冲突，大战于“坂泉”（今河北怀来县），炎帝部落失败。自此，炎、黄、九黎三部落结合成一体，定居中原，成为“华夏族”，即汉族的祖先。据《史记》记载，黄帝为五帝之首，颛顼为黄帝孙，帝喾为曾孙，唐尧为玄孙，虞舜为黄帝九代孙。夏开国君王禹也是黄帝后裔，所以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是符合历史史实的



观念。

大约公元前 2070 年,禹建立夏朝,历商至周史称“三代”,此时华夏族有了更大的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中原周邻的“东夷”“南蛮”“西狄”相继融入华夏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消除了种族之间的隔阂,文字、风俗、学术思想由接近而融合。秦汉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一步推动了疆域内众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建立起规模更大的民族共同体。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为汉族的一统天下。

东汉以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近 400 年,边疆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与汉族杂居相处,学会农耕、汉语言和汉习俗,逐渐汉化,至隋唐时期其民族特征基本消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宋至清,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都分别建立过政权,并在新的统治区内接受和推行“汉法”,加速了本民族汉化的过程;蒙古族和满族还先后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政权,促进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总之,在中国大地上发展起来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并起主导作用;同时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内容,使中国传统文化既具统一性,又具多元区域性发展的特点,并且不断在多元文化汇集交融中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勃兴和转化,因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三)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的经济土壤

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是自然经济体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经济类型,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在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紧密相连的地域内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根植于这两种经济类型之上的文化形态,分别是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这两种文化所培育出来的民族及其精神品格截然不同。一般地讲,农业民族表现出温文的和平自守精神,游牧民族则表现出强悍的攻击掠夺精神。而且,游牧民族似乎是农业民族的天敌,从古代到中世纪,游牧民族一直是农业民族实际的或潜在的军事威胁力量。中国历史恰恰是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紧密相连的地域范围内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关系,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内容。

1. 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农业文化,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建立在自然经济类型的农业基础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证明黄河流域至少在六七千年前就已开始出现农业,因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发源地之一。农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国历代王朝十分重视对农业生产的管理,确立了“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经济政策,并围绕农业经济这个中心展开各种活动,因而农业经济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产习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积累起丰富的农业文化传统。首先,农业生产以土地为本。土地在农业生产中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能稳定地占有一块土地,安定地进行农业生产,就是农民得以生存的基本保证。正是对土地的依赖和眷恋,使得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了安土重迁的习惯及和平自守的精神。其次,农业生产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进行的周而复始的生产过程,这种顺应自然的被动活动,导致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循环论、“实用—经验理性”及性格的平缓、忍耐、随顺和中庸等特点的形成。再次,小农经济的发展,



造成了中国农民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平等、平均思想。历代农民起义大都是以平等、平均为号召,要求社会财富(尤其是土地)和劳动产品分配上的平均一致。

2. 中国古代游牧文化及其与农业文化的冲突、互补及融合

游牧民族一般都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其生活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因而对农业定居区形成了一种进攻性威胁。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两宋时期的契丹、女真、党项,以及后起的蒙古族都是强悍的马背民族,即使是半农半牧半猎的满族也具有游牧民族的强悍特征。从匈奴起,这些马背民族一次又一次侵入中原农业区,给中原文化带来了严重破坏,但也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新的成分和因素。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之间的冲突、渗透和交流,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从形式到内容更为丰富。

(四) 中国传统文化依托的社会政治结构

宗法社会和专制政体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所依托的社会政治结构。

宗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应追溯于中国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的不充分,统治者利用宗法血缘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将氏族制发展为宗法制,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与国联结起来。家庭成了国的缩影,国则是家庭的扩大。无论家与国,其组织系统和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始终未能独立于血亲-宗法关系之外而存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封建社会是宗法封建制。

由于宗法社会是以父家长为核心,国家关系、君臣(民)关系只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因此,对家长的“孝”自然延伸为对君主的“忠”。“忠”“孝”是每个臣民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在政治上衡量个人品质与价值的准则。“家国同构”有效地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并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伦理型特点。

专制政体的主要特征是君权至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始,就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由皇帝总揽大权的统一的政权结构。在2 000余年专制社会结构中,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集立法、司法、军事、行政指挥权于一身,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达到极致,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始终受其控制和支配,形成了以“求治”为目标的鲜明的政治型特点。

“伦理-政治”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伦理-政治”型文化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其前期曾起到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促进生产力发展、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的积极作用,但也包含着相当多的消极因素,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变与分期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中国大地诞生人类那天起便有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9个时期,即原始文化、夏商西周文化、春秋战国文化、秦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隋唐文化、两宋文化、辽夏金元文化、明清(鸦片战争前)文化。



（一）原始文化

原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包括旧石器文化时代和新石器文化时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记载，中国大地上埋藏着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址，至今发现的300多处地点，遍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的“元谋猿人”距今170万年，是我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1963年至1964年间在陕西发现的“蓝田人”，其生活年代约在80万年前；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距今约60万年。考古资料证明，在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的石器出土，“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便注入了人们价值观念，进入了文化范畴。人打磨石器的过程，人在打磨石器过程中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在打磨石器中人与人结成的相互关系，以及最后成就的这件包含着人的价值取向的石器，都是文化现象”^①。“人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实践）改造了自然，使其获得了人的灵气”。人类文化的产生和人类的形成是同步的，“自从人类站起来，脱离兽类，在自觉意识支配下从事生产劳动，自然界就被赋予人的意义，出现反映人的意向和活动的世界，‘文化’也就开始了它一发而不可歇的生命运动”^②。制造和使用石器是人类文化的开始，是旧石器文化的辉煌成就之一。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又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文化创造。北京人文化遗址中灰烬厚达6米，伴有因烧灼而变色、破裂的石块和骨骼，甚至还有木炭。这是文明之火、希望之火，它“第一次使人类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分开”^③，它促进了人的体质进化和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

随着人们打制石器工艺水平的提高，磨制的较精致的石器逐渐代替了原始的、较为粗糙的石器，从距今约一万年以前开始，我国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迄今为止，遍及现今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辽阔版图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七八千处。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大发展时代，其主要文化成就有：第一，发明磨制石器和在石器上钻孔的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发明和制造陶器，把食物放到陶鼎、陶鬲中烧煮，人类已普遍懂得了制作、食用熟食。第三，农业、畜牧业取代了采集、狩猎，并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人们发现了植物生长的周期性，开始人工种植某些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这便是农业的起源。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出土有农具石、耜，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籼稻、粳稻等，陕西半坡遗址中发现粟米、菜籽，中国农耕文化从这里开始。新石器时代还出现了畜牧经济，家畜代替了野生动物，马、牛、羊、鸡、犬、豕基本都成了家畜。这是弓箭使用促进狩猎业进步的结果，使所猎之物有所剩余并畜养起来。新石器时代，人们的食品经济已远非旧石器时代的人们所能想象。第四，原始艺术的产生，其主要成就是彩陶艺术。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表明，在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已经产生了绘画艺术。彩陶的精美造型、多变的纹饰和色彩，不仅表明当时制陶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说明中国先民此时已经具有了美的意识和一定的审美水平。第五，原始宗教的产生，其内容主要是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这一问题将在第二章中详细阐述）。此外，河姆渡

① ②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等：《中华文化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6-27。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4。



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埙、骨哨等吹奏乐器，还有彩陶纹饰中的五人一组手拉手翩翩起舞的欢乐情景，说明新石器时代，已产生了原始的音乐和歌舞。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生活也丰富起来。

总之，遍及祖国各地的石器时代遗址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华大地，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始农耕文化、畜牧文化、陶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共同汇成了中华文化之源，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夏商西周文化

夏商西周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端。夏代国家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国家统治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仁政德治思想、民本思想、忧患意识、殷鉴思想、变易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及礼仪制度等都发端于此，并由此构成了夏商西周文化较为丰富的内容。现就主要内容阐述如下：

第一，由石器向青铜器过渡的夏代文化。自1931年徐仲舒在考古学上首次提出夏文化问题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根据近年来丰富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资料的印证，人们已越来越肯定夏文化的存在，并大致确定了夏文化的特征，即工具形态正由石器过渡到青铜器，出现了城堡、礼器和兵器。这说明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已建立起来。

第二，神本思想盛行、巫史文化勃兴的殷商文化。“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殷商是天神至上的时代，神本思想非常盛行。因此，造就了一批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掌学坛的“中华第一代文化人”——巫史。巫史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崇高地位。从宗教方面说，他们是神人沟通的媒介，是神的意志的唯一权威的阐释者和实际掌握者；从政治方面说，巫史以上天意志的代表而自居，有权力训御君主言行。巫史从事各方面文化活动，并留下了一系列文化成果：其一，由龟卜而创造了甲骨文，为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了现今已知年代最早、体系比较完整的文字。其二，由占筮而得八卦之象，积累了大量筮辞，经筛选、整理、编排，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周易》，其中的变易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三，由书史而成为中国史学的先驱，并为中国传统史学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其四，由卜筮、祭祀而观察天象，并发明六十干支纪日法及纪月、纪年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历法的基础。其五，巫史还是文化的传播者、教育的实施者，对商周时期的教育作出了贡献。

第三，神本思想向人本思想过渡，敬德保民思想和殷鉴思想盛行的西周文化。西周统治者继承并发展了殷商的天命神权思想，但他们并不完全信赖天命，而是引进了“德”的范畴，来解释王朝兴替、人事盛衰等社会现象。西周统治者认为有德，故受天之天命，武王有德，故能克商。但“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民心有常”，而要得到“民心”，就要施行“德政”。因此，他们提出了“敬德”的思想，用德来配天命，以巩固其统治。“德”的具体内容：一是“敬天”；二是“保民”，对“小民”要宽厚，要行一点恩惠，以使人民不离开自己，不反对自己。“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的进步，说明周人在天人关系上，不再似殷人完全听于天命，而是在天神思想笼罩下，尽人事以待天命。“敬德保民”思想是神本思想向民本思想的过渡，并成为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的根据。应该指出的是，周人“敬德保民”思想是在总结殷商灭亡的经验教



训中提出的。“天命靡常”，殷原有“天命”，但因残暴的统治却失去了上天的庇护而最终灭亡。所以，周初的统治者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殷鉴”思想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和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四，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对夏商以来的文化进行总结和提炼，创立了注意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并以“敬德保民”为特点的礼乐制度。这一制度成为其后儒家礼仪制度的蓝本，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

第五，以青铜为代表的物质文化成就。殷周时代是青铜器的成熟期和盛行期，以“青铜时代”著称于中国传统文化史。殷商时代，生产、生活以及战争所需种种器物，多用青铜制造，尤其是青铜工具较普遍的使用，使生产力得到飞跃式提高。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的剩余，嗜酒之风盛行，殷商酿酒技艺已达相当水平。商周之世，服饰也已进入了上衣下裳、束发右衽、顶冠蹀履的衣冠时代；交通的主要工具是舟车，“陆行乘车，水行乘船”（《史记·夏本纪》）。出行乘舟车在夏商西周时代已成司空见惯的事。由此可见，此时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已相当丰富。

（三）春秋战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空前繁荣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各家相互批判，又相互吸收、渗透和融合，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时期，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诸子的学术思想和师承流变，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现将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化大事概述如下：

第一，“士”的崛起和私学的繁荣。在春秋战国时代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上，崛起了专掌文化知识、不耕而食、不富而贵的脑力劳动者阶层——“士”，他们对社会的改革、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直接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和“百家争鸣”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冲破了西周宗法等级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贵族垄断文化事业的“学在官府”的局面。与之相反，“私学”的兴起，使大批新兴地主、商人、平民子弟也有机会接受教育。“私学”的兴起有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文化传播，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百家争鸣”构建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民族精神。孔子创立了以民为治国之本、以仁为思想核心、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义为价值准绳的儒家思想体系。这是一个与社会政治、个人身心性命紧密相关的文化体系，经后世儒学传人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儒家重人道的入世精神相反，道家不重人道重天道，表现出超世、顺世、游世的个体价值和精神自由。此外，法家和儒家一样重人道而轻天道，倾向于社会人生问题；墨家在天人关系上与道家颇为契合，大力提倡天道观。儒、道、法、墨四家在其学说的表征上各不相同，但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却是其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四家在相互争辩中相互吸收、渗透，发展了相互贯通的一面，共同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构建提供了思想资料；同时，也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自强不息、关心他人、讲求道义、注重整体利益、强调个人价值等基本精神内涵；并表现出诸子百家“和而不同”的包容品格和博大精神，对民族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由于历史的渊源、地理差异、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等